

# 从文化史与经典化研究 看传统莎学名望研究之转型\*

辛雅敏

---

**【摘要】**20 世纪下半叶，由于材料的穷尽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变革，传统莎学中的名望或身后名研究开始衰落，但另一种研究范式的出现延续了莎学界对莎士比亚名望问题的关注，那就是从文化史角度考察莎士比亚的经典化问题。这种研究迎合了文学理论中的左派建构主义立场和文化研究转向，成为晚近莎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17、18 世纪的莎士比亚改编剧问题便是这种文化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改编剧被传统莎学家轻视，但被持左派立场的文化史研究者重视，被认为是早期莎士比亚经典地位构建的重要方式之一。不过建构主义深入历史语境的考察虽然深刻，但其忽视文本内在价值的做法也同样值得商榷。

**【关键词】**莎士比亚 文化史 经典化 名望研究

**【作者简介】**辛雅敏，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I561.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 - 1125 (2023) 08 - 0134 - 13

---

英语中有 bard 一词，意为“诗人”或“吟游诗人”，但首字母大写的 Bard 前面加定冠词 the，就变成了特指莎士比亚的一个词。不仅如此，从这个词引申而来的另一个词 bardolatry，虽然字面意思为“诗人崇拜”，但其实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莎士比亚学术考证的起源、体制化与转型研究”（21BWW063）、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人才支持计划（2022 - CXRC - 16）的阶段性成果。

特指“莎士比亚崇拜”。<sup>①</sup>这种作家享有专有名词的待遇可以说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都是少见的。在今天的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莎士比亚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偶像，我们会在音乐、绘画、电影、文创、旅游等各种文化领域看到莎士比亚的影响和其中的莎士比亚元素。然而，这显然是一种长期的文化挪用的结果。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并非一开始便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位大作家在世时虽然已有一定声望，获得了一些世俗的成就，但其实连文学偶像都算不上，更谈不上经典作家了。这是因为在文学史上，传世的作家作品往往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才会被奉为经典的。不过，作家的名望并非一成不变的，生前的名气与其身后名也往往并不相同。有的作家少年成名，活着的时候便知道自己会永垂不朽，去世后更是万人敬仰，文学地位也几乎从未受到挑战，如歌德和雨果；也有的作家在世时名满天下，举世瞩目，如明星闪耀于文坛，去世后却经历了名望的不断下降，比如拜伦；还有的作家在世时寂寂无闻，去世后却名满天下，其名望与在世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卡夫卡。但莎士比亚的情况不同于以上任何一种，其名望变化过程是一个作家不断积累名望并逐步经典化的最典型的案例，而20世纪英美莎学界对莎士比亚身后名变化的研究也经历了从传统的名望研究到文化史和经典化研究的转型，本文便试图说明此种转型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的原因。

## 一、传统莎学中的名望研究

莎士比亚的世俗生活如何，史料记载并不多。身为小镇青年、手套商儿子的莎士比亚大概二十多岁时只身前往伦敦谋生，此后写诗作剧，从演员一步步成为剧团股东，最后既有了文学上的声望，也获得了世俗的成功。大概在1611年前后，莎士比亚便开始在斯特拉福镇过起了悠闲的退休乡绅生活，而此时的他还不到五十岁。从莎士比亚还乡置业并早早退休的经历来看，这位剧作家虽然在世时已有些名气，但应该从未想过自己能靠戏剧名垂青史。他在意的是能否通过在戏剧界建立的功名来换取一些实际的好处，比如如何在故乡买下好房子和土地，衣锦还乡、安享晚年；如何从当时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工商业从业者变为拥有家族纹章的乡绅；等等。甚至连约翰逊博士也对他起怀疑之心：“莎士比亚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值得流传后世，他并不

<sup>①</sup> bardolatry 一词由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在1901年首创，本意是讽刺盲目的莎士比亚崇拜，但流传开之后逐渐具有中性色彩。

要求后世给他崇高名望，他希望得到的只是当世的名声和利益。”<sup>①</sup> 不过这么说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莎士比亚在自己的十四行诗中很自信地认为这些诗歌能永世流传。<sup>②</sup> 因此，从他的作品和行为来看，可以肯定莎士比亚即便想过自己会作为一个诗人名垂青史，也应该从没想过会作为戏剧家被后世铭记，甚至有许多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创作戏剧时根本没想过要出版这些剧本。<sup>③</sup>

实际上，虽然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作为剧作家广为人知，但当莎士比亚在1616年去世的时候，他的死并没有给英国文化界带来任何轰动效应，也没有激起任何感伤的情绪，甚至在他去世当年提到过他的文化界人士也寥寥无几；而在接下来的1617年，现有的资料显示，整整一年中只有两个人提到过他。<sup>④</sup> 可以说，在莎士比亚去世时已经没有人还记得这位伦敦戏剧界曾经的风云人物，作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此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并走到了被世人遗忘的边缘，他的十四行诗也不足以让他被世人铭记，而作为民族诗人和英国文化符号的莎士比亚还远远没有诞生。因此，“对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来说，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同时代人，并不是普遍荣耀的传人”。<sup>⑤</sup> 直至17世纪下半叶，虽然褒奖的声音开始不断涌现，但英国的作家和批评家们还普遍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粗俗的，莎士比亚也未必比琼生或弗莱彻等同时代的剧作家更伟大。然而到了18世纪下半叶，莎士比亚的文学经典地位已完全确立，其民族诗人和文化偶像的身份也广为人知。到19世纪初浪漫主义兴起时，莎士比亚更是被推上神坛，成为全欧洲的浪漫主义偶像。

那么，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因素推动莎士比亚走向了新的经典作

① 杨周翰编选：《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② 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5首、17首、18首、19首、63首、81首、107首等篇目，可见“用诗歌战胜时间”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个常见主题。但话说回来，这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来自古代的文学主题，起码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奥维德在《变形记》结尾就曾表达类似的思想。受此影响，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都曾吹嘘自己的诗歌将永世长存，因此莎士比亚是真的认为自己的诗歌能够流芳百世，还是仅仅借用了当时许多诗人都会用到的“套话”，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参见[英]西德尼·李：《莎士比亚传》，黄四宏译，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122~126页。

③ 参见[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郝田虎、冯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7~42页。

④ 参见C. M. Ingleby and John James Munro, eds., *The Shakspeare Allusion-Book: A Collection of Allusions to Shakspeare From 1591 to 1700*, Vol. 1, London: Chatto&Windus, 1909, p. xiv.

⑤ C. M. Ingleby and John James Munro, eds., *The Shakspeare Allusion-Book: A Collection of Allusions to Shakspeare From 1591 to 1700*, Vol. 1, London: Chatto&Windus, 1909, p. xx.

家的地位，获得了新的文化身份？莎士比亚是如何从伦敦戏剧界的退休乡绅变成万众瞩目的文学大师和英国文化偶像的？这个变化是何时发生的、怎样发生的？其实在传统莎学界，很早便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这种研究后来也就变成了传统莎学的一个分支，即莎士比亚的名望或身后名研究（reputation study）。最初这一问题进入莎学家的视野与传统莎学的另一个问题有关，即莎士比亚的作者身份问题，不过此类研究一直未能成为莎学界主流。早在1848年，美国作家约瑟夫·哈特（Joseph C. Hart）便著书声称莎士比亚并非莎剧的作者，因此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名望是在17、18世纪不断积累而来的。不过哈特这种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莎士比亚名望积累的过程，而是证明莎士比亚并非莎剧的真正作者。莎学中真正涉及莎士比亚名望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莎学家对莎士比亚批评史的梳理。著名莎学家克勒门·英格尔比（Clement Mansfield Ingleby）曾编纂过一部莎士比亚指涉辞典，并将之命名为《百年莎士比亚美誉：莎士比亚及其作品评论资料汇编》（*Shakespeare's Centurie of Prayse: Being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Opinion on Shakespeare and His Works*, 1874），此书收集了从1592年到1692年百年间文坛对莎士比亚的赞誉。1879年，这本书在当时著名的新莎士比亚协会<sup>①</sup>的资助下出版了增订版，而后来莎学家约翰·门罗（John Munro）又将该书扩展为《莎士比亚指涉辞典》（*The Shakespeare Allusion Book*, 1909），在莎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导致同一时期类似的书籍也时有出现。

莎士比亚名望研究繁荣于20世纪，最开始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莎士比亚在文学批评史上引起的争论，以及与之相关的莎士比亚名望的变化。此类研究往往将莎士比亚置于关于文学品位的争论中，将其在文学领域名望逐渐增加的过程解读为他能够成为经典作家的原因。1901年，托马斯·劳恩斯伯里（Thomas Raynesford Lounsbury）的开创性专著《作为戏剧艺术家的莎士比亚：他各时期的名望》（*Shakespeare as a Dramatic Artist, with an Account of His Reputation at Various Periods*）就是这类研究的代表作。与完整的莎评史不同，这类研究主要关注莎士比亚的早期名望问题，考察莎士比亚如何在17、18世纪从众多本土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英国民族诗人的代表。另外，由英格尔比开创的莎士比亚指涉研究在20世纪也得到了传承，如到了20世

<sup>①</sup> 新莎士比亚协会（New Shakspeare Society，其中“Shakspeare”的拼写与今天不同）由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克·弗尼韦尔（Frederick James Furnivall, 1825—1910）创立于1873年。因莎学家约翰·科利尔（John Payne Collier, 1789—1883）曾于1840年创办“莎士比亚协会”（Shakespeare Society），故弗尼韦尔创办的协会被称为“新莎士比亚协会”。

纪40年代,杰拉德·本特利(Gerald Eades Bentley)编著的《莎士比亚与琼生:两人名望在17世纪的对比》(*Shakespeare and Jonson: Their Reput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mpared*)便是这类研究在20世纪的发展。

在指涉研究更加深入的同时,传统莎学中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也更加深入,开始转向对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考察,即分析莎士比亚获得赞美的原因,将提问方式从莎士比亚如何获得美誉、获得哪些美誉变为莎士比亚为何能够获得这些美誉,为何能在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进而成为民族诗人的代表。不过与20世纪末的学者们在政治、文化、历史等语境中寻找答案不同,20世纪上半叶的学者们还是更倾向于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文学品位的变革中寻找原因,如普渡大学教授罗伯特·巴布考克(Robert W. Babcock)在30年代出版的专著《莎士比亚崇拜的起源,1766—1799》(*The Genesis of Shakespeare Idolatry, 1766 - 1799*)便是此类研究的代表。此书的副标题为“18世纪晚期英国文学批评研究”(A Study in English Criticism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这一副标题本身便已经说明作者的意图在于从文学批评中寻找莎士比亚崇拜的源头,书中主要讨论的则是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文学批评家在莎士比亚评论中是如何逐步摆脱古典主义诗学原则的束缚,最终走向浪漫主义的莎士比亚神话的。此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巴布考克注意到了18世纪报纸杂志的价值,花费巨大精力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引用了大量报刊中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证明莎士比亚的名望变化,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传统文学批评研究的文献资源。

## 二、考据的衰落与理论的兴起

莎士比亚的名望研究属于传统莎学考证的范围。历史和文本考证(校勘)是传统莎士比亚学术考证的基础,但20世纪以来,在国别文学史研究中,由于以历史研究和文本校勘为代表的考证型学术研究在西方不断衰落,传统莎学考证也在消亡与转型中不断挣扎,莎士比亚名望研究也是如此。而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研究本身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个威胁传统学术考证地位的因素在于考证材料本身的匮乏。文学考据以厘清事实为己任,但在欧洲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中,从文艺复兴开始算起,民族作家的创作历史也不过四五百年,而文学考证的历史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也已经有一百余年,可明辨的事实大多已辨析清楚,可释义的文字也已阐释殆尽。在没有新材料和新文献被发现的情

况下，到了20世纪中叶，许多传统的莎学考证方向已难以产生有价值的新成果。

在传统文学考证自身遇到材料穷尽问题的情况下，第二个挑战其地位的是文学批评的体制化。在20世纪之前，文学批评往往被认为是文学创作的附属，但随着英美新批评的崛起，文学批评开始进入大学，成为体制化的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批评家像从事学术考证的学者一样成为大学教授。<sup>①</sup>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学术考证受到了很大冲击，美国新批评思想流派的重要成员艾伦·泰特（Allen Tate）就曾借用福克纳的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花》中的内容写作了《艾米丽小姐与目录学家》一文，并在其中将目录学家比作被艾米丽小姐藏匿的尸体，以讽刺其抱残守缺、僵化而无意义。<sup>②</sup>不过文学批评虽然侵占了考证型研究的学术资源，但并没有将之置于死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即便如此，在40~50年代批评家与学者之间达成了一种能够减少相互对立的共识：批评家们是从‘内部’处理文学作品‘本身’的问题的，而文学史研究者们则处理文学作品的‘外部背景’问题。更确切地说，批评与历史各自都是一个完整的文学认知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任何一个教授都可以既是批评家也是学者，而这两种功能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开始减少。”<sup>③</sup>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在著名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8）一书中提出的文学研究三分法将文学史考证和文学批评置于互相依存的理想关系中，也是这种共识的表现。于是，在各司其职的情况下，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考证的共同目标都在于加深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二者在学术体制中的关系也在20世纪中叶从对抗走向共存。

不过，除了以上这两个因素，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大的变革来临。随着解构主义等思想在英美产生影响，文学理论迅速兴起，情况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文学理论不同于韦勒克和沃伦设想的存在于文学“本体”范围内的关于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而是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并且抛弃了价值判断的多元“理论”，而这正是韦勒克等人反对的。这种文学理论的繁荣不断在大学的文学研究体制内同时

① 参见辛雅敏：《文学批评的改造与独立——从艾·阿·瑞恰兹到诺斯罗普·弗莱》，《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94~99页。

② 参见 Allen Tate, *Miss Emily and the Bibliographer*,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9 (4), 1940, pp. 449 - 450.

③ Gerald Graff,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183.

侵蚀着以事实判断为己任的传统学术考证和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文学批评，韦勒克等设想的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之间互补的理想状态已不复存在。

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来自欧洲大陆的各种带有左派色彩的理论开始影响英美学术界，其结果是几乎重塑了文学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的格局。在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影响下，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被不断强调。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考察知识的来源问题成为学术界的显学。于是，传统学术研究由历史研究和文本考证得来的知识开始受到质疑，通过学术考证来获得知识的方法本身也开始受到质疑。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出现了大量重新考量文学经典、反思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并形成了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互相对立的经典理论。本质主义理论以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这类“经典的捍卫者”为代表，仍然坚持从文学经典的内部价值出发捍卫经典的地位；而反本质主义的各种建构主义理论则声势浩大地集合了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和文学研究新势力，抛开文学经典的内部审美价值，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权力等外部因素考察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强调经典作家作品的形成是一种历史建构的结果，此类研究目前已经在英美学界广为流行。

这种思潮自然也反映在莎学界，于是关于莎士比亚的知识不再是学术考证可以确定的事实，而变成了一种知识生产的结果。那么问题就变成了谁在生产这些关于莎士比亚的知识，为什么要生产这些知识。提问方式的改变导致传统学术考证赖以存在的事实性前提受到了破坏，如在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那里，文学与历史都只是大文化的一部分，都是某些社会、政治、文化力量在一系列的权力运作中塑造的产物。而在西方历史学界，“新文化史”研究开始兴起。这种历史研究一方面更“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sup>①</sup>毫无疑问，与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文化转向一样，这种立足于社会文化的史学是一种反精英主义的、微观的、大众文化的历史研究。

<sup>①</sup> 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不约而同地向文化研究靠拢，学科壁垒与界限更加模糊。另外，莎士比亚并无手稿存世，生平文献也十分有限。到了20世纪下半叶，传统莎学又面临史料穷尽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传统莎学必然也要经历巨大的变革，其中大部分已经充分考证的问题逐渐失去了研究价值，造成莎学中有些研究方向的衰落；而另外一些问题则与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融合并开始转型，以新的提问方式出现，如莎士比亚名望问题。

在这种研究范式转型的背景下，新时代的莎士比亚研究不再狭隘地关注莎翁文学声望的变迁，而是转向在更广阔的文化领域考察莎士比亚名望崛起的过程。于是，这种新的研究逐渐放弃了对传统莎评等文学内部动因的关注，转向考察并分析与莎士比亚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探求其背后的政治与权力动因，进而以左派立场达到消解莎士比亚这位白人男性作家经典地位的目标。因此，这种变化体现的不仅是研究范式的转型，更是研究者立场的变化。到了20世纪末，由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左派建构主义立场的学者频繁活跃于莎学界，文化史研究开始代替传统名望研究。

### 三、反思经典化，走向文化史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莎学界出现了两部研究莎士比亚名望变化的书，虽然这两部书的研究都不算深入，但标志着莎学中这一传统问题的某种转型已经开始，因为两位作者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莎士比亚在文化领域的传播问题。1957年，英国学者哈勒迪（F. E. Halliday）出版了一部全面研究莎士比亚身后名的著作，书名叫《莎士比亚教》（*The Cult of Shakespeare*），书中简要回顾了莎士比亚去世之后在各种文化领域中名望的变化。1963年，美国学者路易斯·马德（Louis Marder）出版了《他的退场与出场：莎士比亚的名望史》（*His Exits and His Entrances: The Story of Shakespeare's Reputation*），此书前半部分对传统莎学中的许多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总结，梳理了包括莎士比亚文本研究、生平传记研究、作者身份研究在内的诸多传统莎学问题，并试图以此来说明莎士比亚名望的变迁；而后半部分则主要关注斯特拉福镇的莎士比亚庆典、莎士比亚肖像的变化、莎士比亚的伪书事件、莎士比亚在英语教育中的作用等文化领域的传播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后来的莎士比亚文化史与经典化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此外，到了1970年，著名莎学家、莎士比亚传记专家塞缪尔·舍恩鲍姆（Samuel Schoenbaum）出版了一本名为《莎士比亚的不同生命》（*Shakespeare's Lives*）



的著作，此书植根于莎士比亚传记研究和其他考证型莎学研究，系统地梳理了莎士比亚去世后在各个领域的名望变化，可以说是传统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与莎士比亚传记研究结合的成功典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传统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国外莎学界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热点，那就是考察莎士比亚在17、18世纪经典化的过程，并发掘这一过程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目的在于强调“莎士比亚”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文化符号。在这种新的认识下，传统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虽然随着莎学考证的衰落而彻底消亡，却经过研究范式的转型以新的面貌重现，变为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和文化史研究。这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及论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加里·泰勒（Gary Taylor）的《重新发明莎士比亚：从王政复辟到当代的文化史》（*Reinventing Shakespeare: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Present*, 1989）、玛格利塔·德·格拉西亚（Margreta de Grazia）的《逐字逐句莎士比亚：1790版莎士比亚与复制的真实性》（*Shakespeare Verbatim: The Reproduction of Authenticity and the 1790 Apparatus*, 1991）、迈克尔·道布森（Michael Dobson）的《创造民族诗人：莎士比亚、改编剧与作者身份，1660—1769》（*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 Shakespeare, Adaptation, and Authorship, 1660 - 1769*, 1992）、简·马斯登（Jean I. Marsden）的《重构的文本：莎士比亚、改编剧和18世纪文学理论》（*The Re-Imagined Text: Shakespeare, Adaptation, & Eighteen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 1995）、罗伯特·休姆（Robert D. Hume）的论文《莎翁之前：“莎士比亚”在18世纪早期的伦敦》（*Before the Bard: “Shakespeare”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London*, 1997），以及艾玛·德普莱奇（Emma Depledge）的《莎士比亚崛起至文化显赫：政治，印刷和改编，1642—1700》（*Shakespeare's Rise to Cultural Prominence: Politics, Print and Alteration, 1642 - 1700*, 2018）等。这些研究虽然也处理莎士比亚的身后名问题，但几乎与传统的名望研究完全决裂，很少引用前人的相关成果，甚至闭口不提文学批评和文学品位的变化，而其关注的共同点在于，在莎士比亚被经典化的过程中都有哪些外部因素和力量在起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的，或者说，“莎士比亚”这一文化符号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因此，这种考察莎士比亚如何成为“莎士比亚”的研究不仅涉及戏剧舞台史和演出史、编辑校勘史、新闻出版史、审查制度史等方面的史学考证，还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其他人文社会领域，最终难免会综合成一种关于莎士比亚的文化史。较早进行相关研究的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加里·泰勒为这种新的研究起了

一个名字，叫“莎氏名学”（shakesperotics）。<sup>①</sup>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莎士比亚在17、18世纪经典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莎士比亚获得经典作家身份，乃至成为“莎士比亚”这一文化符号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起码涉及当时的莎剧演出史、文本校勘史以及莎士比亚批评史等传统莎学研究，还涉及各种与莎士比亚有关的文化现象，也就是新兴研究中处理的各种大众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因素。这是因为17、18世纪不仅是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而且是整个英国民族文学经典形成的关键时期。贵族制度的衰落、印刷术的发展、读者群体（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兴起、书籍交易市场的形成、文学创作的职业化、历史意识的凸显与文学史考证的专业化等文化与文学领域的变革催生了最早一批被经典化的欧洲现代民族作家，而莎士比亚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也就是说，恰恰是欧洲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所谓的民族文学经典。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发生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许多文化现象都在“莎士比亚”的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莎士比亚庆典、莎士比亚伪书事件、对莎剧的各种改编甚至戏仿、莎剧插图展览等。这些文化现象都是莎士比亚影响力不断扩张的体现，而这些现象级事件反过来也促进了莎士比亚经典化的进程。不过，此类研究的问题也在于其背后的立场表达甚至政治诉求十分强烈，因此往往过于夸大政治、文化因素在莎士比亚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莎剧丰富的文本含义等内在因素。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虽然经过了研究范式的转型，但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确立的历史进程既是一部早期莎学史和莎评史，也是一部早期莎剧演出史乃至早期莎士比亚文化史，是传统莎学研究与新兴的文化研究共同处理的对象，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认知上的偏颇。

持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从文化史角度出发，在将研究视野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同时，也对许多此前被忽视的与莎士比亚有关的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重新评估，我们可以通过早期莎士比亚改编剧的例子来以小见大，窥见这种研究的立场变化。

17世纪下半叶，曾经流亡法国的英王查理二世成功复辟，来自法国的古典主义戏剧品位开始流行，与古典主义格格不入的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在英国舞台上的受欢迎程度并不算高。为了迎合复辟时代的戏剧观众，剧作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和威廉·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等开始

<sup>①</sup> “莎氏名学”译名来源于郝田虎的论文，见郝田虎：《发明莎士比亚》，《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85页。

对莎剧进行改编。此后，莎剧改编风靡一时，剧院大量上演经过改编的莎剧成为17、18世纪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从复辟时代到18世纪下半叶，绝大部分莎剧都被改编过，甚至在整个复辟时代，伦敦戏剧舞台上演出的莎剧大部分都是经过改编的，并非莎剧的本来面目。

传统的莎士比亚名望研究专注于文学批评，几乎不考虑改编剧的问题，大部分学者也不屑于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偶尔有些系统的研究，研究者也往往嗤之以鼻，认为这些改编剧是对莎剧文本的篡改与侮辱，如改编剧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弗雷德里克·基尔伯恩（Frederick W. Kilbourne）博士出版于1906年的《莎士比亚改编剧》（*Alte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Shakespeare*）一书虽然对改编剧进行了系统研究，但明显受到莎翁崇拜情绪的影响。他对改编剧的偏见与厌恶非常明显，全书提及各种改编剧时用了大量诸如“可耻的”“胆大妄为的”等修饰语，并直言不讳地将改编剧形容为“病态”和“暴力的残害”等。在评价改编剧时基尔伯恩宣称：“由于坚持一种错误的艺术原则以及由这种错误原则所带来的对莎士比亚的粗暴侵犯，这些剧作家与批评家将自己理解力的缺陷展示得一览无余。”<sup>①</sup>他认为改编剧“不仅严重缺乏真正的戏剧技艺，而且也缺乏对伟大戏剧家应有的尊重”。<sup>②</sup>乔治·奥德尔（George C. D. Odell）1920年在其莎士比亚舞台史研究巨著《莎士比亚从贝特顿到欧文》（*Shakespeare from Betterton to Irving*）中也常常用“暴行”之类的词来形容改编行为，他还认为：“戏剧舞台上对莎士比亚的玷污恰恰始自他的崇拜者戴夫南特……在这方面他比基利格鲁所犯的罪行大得多，起码后者单调地将《奥赛罗》和《裘力斯·凯撒》搬上舞台时基本按照莎士比亚的原样。”<sup>③</sup>黑泽尔顿·斯潘塞（Hazelton Spencer）于1927年出版的《被改良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mproved*）一书在措辞上相对缓和一些，但提起改编剧时仍使用了大量诸如“偷窃”“盗用”等词语。直到20世纪末，持保守立场的著名莎学家布莱恩·维克斯（Brian Vickers）还是坚持认为改编剧是对莎士比亚的亵渎。

不过，由于受到日渐兴起的各种左派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持建构主义立场的当代研究者们更倾向于从客观甚至积极的方面考察改编剧。道布森

① Frederick W. Kilbourne, *Alte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Shakespeare*, Boston: The Poet Lore Company, 1906, p. 16.

② Frederick W. Kilbourne, *Alte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Shakespeare*, Boston: The Poet Lore Company, 1906, p. 19.

③ George C. D. Odell, *Shakespeare from Betterton to Irving*, Vol. 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0, p. 24.

在《创造民族诗人——莎士比亚、改编剧与作者身份，1660—1769》中的观点很具代表性，他这样说道：

完全的经典化与大量的改编并存，在将莎士比亚的文本奉为国宝的同时却改变其内容，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一个古怪的悖论，改编版的莎剧通常被认为充其量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怪异的死胡同，在莎士比亚的“真实”接受史上无关紧要。但我认为，这种观点严重扭曲了我们对莎士比亚在奥古斯都时期文化中不断变化的角色的理解，而且暗示了他在我们时代的持续影响力，因为在那个时期汇聚在一起确立了他的霸权地位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也一直持续至今。我希望在本研究的过程中表明，改编和经典化不仅远非矛盾的过程，而且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声称莎士比亚是启蒙文化英雄，既受益于对他的戏剧的改编，有时也需要这种改编。<sup>①</sup>

因此，在道布森看来，“改编剧是‘真正的’莎士比亚被建构的众多和可能的手段之一”。<sup>②</sup>总的来说，持建构主义观点的当代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将改编剧视为一种文化挪用现象加以解读，认为这种对原著文本的改造和重新阐释是文化生产者们应对新的历史语境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就推动了莎士比亚的经典化进程。这也是许多当代学者对待改编剧的态度。

改编剧问题当然只是文化史与经典化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从中可以看出研究者立场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只是更大范围内的文学研究变革的一部分而已。从最近30余年西方的莎学研究情况来看，除了哈罗德·布鲁姆和布莱恩·维克斯等少数老派学者仍立场明确地坚持莎士比亚文本的内在价值和超越时代的经典属性，相当一部分莎学家都在左派理论和文化研究等思潮的共同影响下重新回到莎士比亚文本赖以存在的多元文化和历史语境，认为莎士比亚的文化身份和经典地位是一系列外部因素和权力话语共同作用的结果。

#### 四、结语

伊格尔顿在著名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设想了在价值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种前景，他这样写道：“所谓的‘文学经

<sup>①</sup> Michael Dobso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 Shakespeare, Adaptation, and Authorship, 1660 - 176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p. 4 - 5.

<sup>②</sup> Michael Dobso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 Shakespeare, Adaptation, and Authorship, 1660 - 176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10.

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construct）。根本就没有本身（in itself）即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传统，一个可以无视任何人曾经或将要对它说过的一切的文学作品或传统。……因此，假定我们的历史能发生足够深刻的变化，我们将来很可能会创造出这样一个社会，它将完全不能从莎士比亚那里再获得任何东西。他的作品那时看起来可能只是完全不可理解地陌生……在这种情况下，莎士比亚也许不会比今天的很多涂鸦更有价值。”<sup>①</sup>这显然是一种较为极端的建构主义观点。我们很难说伊格尔顿描绘的前景是否真的会出现，但不可否认，这种变化正在发生。只不过对坚持精英主义和本质主义立场的右派学者来说，这种前景是灰暗的；而对坚持建构主义立场的左派学者来说，这种前景是光明的。这两种对立观点的背后是对文学经典观念的不同认知乃至政治、文化立场的分野。

从传统的名望研究到目前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文化史和经典化研究，传统莎学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转型，见证了建构主义立场的兴起。建构主义深入历史语境的考察虽然深刻，但其完全忽视文本和传统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的做法也显得有失偏颇，难免有矫枉过正甚至盲目追求政治正确的嫌疑。外部因素在早期莎士比亚名望史和文化史中也许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纵观400年来的莎士比亚接受史，直至20世纪下半叶，莎士比亚的文本仍因其丰富的内涵而得到一代代批评家的青睐。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莎士比亚能拥有今天崇高的经典地位，单靠一种外部或内部因素显然是无法解释的，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莎士比亚文本本身复杂性的因素，也有某些社会、政治、文化的权力话语运作的因素，甚至还有一些机缘巧合和运气的因素。总之，1616年4月23日，一位叫莎士比亚的乡绅在沃里克郡的斯特拉福镇去世，但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命运才刚刚开始，直到今天，只要还有人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生命就没有终止，他创作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

（责任编辑：陈华积 权 达）

---

<sup>①</sup> [英]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